

没有声音的地方就是寂寞

声のないところは寂寞

诗人何其芳的一生

【日】宇田礼 著
解莉莉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没有声音的地方就是寂寞

声のないところは寂寞

诗人何其芳的一生

【日】宇田礼 著
解莉莉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没有声音的地方就是寂寞: 诗人何其芳的一生 / (日) 宇田礼著; 解莉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7-5097-1401-0

I. ①没… II. ①宇… ②谢… III. ①何其芳 (1912 ~ 1977) —生平事迹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69040 号

没有声音的地方就是寂寞 ——诗人何其芳的一生

著 者 / [日] 宇田礼
译 者 / 解莉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国际出版中心 (010) 59367197
电子信箱 / guoji@ssap.cn
项目经理 / 仇 扬
责任编辑 / 刘 玮 郭荣荣
责任校对 / 徐 莉 孙光迹
责任印制 / 董 然 蔡 静 米 扬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 11 字数 / 280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1401-0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2009-0349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3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没有声音的地方就是寂寞

——诗人何其芳的一生 001

何其芳论（一）

诗人的夜 233

何其芳论（二）

诗人的白昼 267

后记（一） 328

后记（二） 331

没有声音的地方就是寂寞

诗人何其芳的一生

何其芳

那时，他作了一首短诗。小驴不断转动的耳朵，那就是诗人思考的希望。那时他 29 岁，在革命圣地延安。中国人之所以喜欢他的诗，是因为诗人直面自己的悲哀与软弱。

我看见了一匹小小的驴子，
它是那样跳跃，那样欢喜，
干燥的多尘土的道路，
在它的蹄下也像是一片草地。
它不知道它长大了的时候，
它的背上将压上什么东西。
它来到世界上还不久，
它能够那样轻快地跳跃，
那样快活地呼吸。
看它是怎样摇动着这耳朵呵，
看它这个小东西！

第一章

何其芳的一生是作家、战士、学者的一生。

——卓如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本部大楼位于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从通往天安门广场的大马路往右拐，右侧就是正门，但是出租车不能进。汽车要绕过正门旁边的马路，在两侧布满老房子的小路上右转两次开到常用门。炎热的一天又来临了，身着整齐的绿制服的年轻人站着岗，汽车停下了。我看不出他是士兵还是警察，或是单纯的警卫。

我们即将访问的文学研究所也在这扁平四方的钢筋水泥的“箱子”里，在这炎热的8月被一股热气包围着。给我和佟教授两个中文不大灵光的我们做翻译的周美仪，站在院内一角，好像在向它致意似的，仰望着褐色的社科院大楼。

院内建筑物的数量和配置与何其芳任所长的19世纪60年代不同。那时，还没有这座楼。研究人员从所里领到桌子和椅子，桌子上堆满了书，构筑着自己的小城堡。

当时作为中央机关的文学研究所对研究人员的要求是：专业人员每年写5万字以上、兼职业务管理人员写3万字以上的论著。

何其芳所长上午处理杂务，下午的时间被占用于议事或开

会，整个白天的时间用于管理业务。其间还包括审稿和与年轻学者交谈。他自己用于研究和写作的时间，原则上是在回家以后直到深夜。即便如此，他也坚持每年发表4万字左右的学术论文。4万字换算成日文大约10万字。

如今，研究业务不在这座楼里展开。国家授予研究人员教授、副教授、助教等职称，但是，楼里不设研究室（个人专用的——译者注）。他们的“研究室”就是个人的书斋或去图书馆。分给文学研究所的楼层除了用作行政官员和事务官员的办公室以外，还用于每周召开一两次会议或集会。

一楼的电梯大厅像暑假中的大学校舍一样，寥无人迹。上了电梯，坐在椅子上的电梯服务员正等着乘客。木制的高椅子占据了相当的空间，电梯服务员听了我们的去向，按下了7号键。

文学研究所的接待室在7层，我们坐在754号接待室的沙发上等待何其芳夫人牟决鸣的到来。窗户敞开着，两台立式电扇旋转着，机头来回摆动，改变着送风方向。

文学研究所所在的大楼朝向南面的大马路，而由于接待室在楼的北面，所以出了名的北京汽车喇叭声几乎传不上来。但偶尔也会有轰鸣声传来刺痛耳膜。此时，挂着窗帘，遮断视线的“载着”大人物的汽车从眼前驶过。

诗人何其芳任文学所所长时期，也坐过挂着窗帘的汽车吗？真想看到他坐车时的表情。按我的想象，即便他因公务而乘坐汽车，也一定坐得不舒服，因为驱散人群的警笛和象征权威的窗帘都不适合诗人。

关于汽车传来的噪声，乔象钟曾这样回想：

他（何其芳）的办公室临街，大马路上川流不息的大卡车、公共汽车的马达声、喇叭声在窗前轰鸣而过，他却埋头处理日常事务，阅读、批改文件，仿佛没有听到。在那块

破了一角的玻璃板的桌子前，坐过了他的壮年时代，磨破了他的衣袖。

“破了一角的玻璃板”、“磨破了的袖子”是何其芳晚年的诗《写给寿县的诗》（1971年）中的句子。

何其芳是否“什么也没听见”，姑且不论，但他可以包容大卡车和公共汽车发出的噪声，因为，这是新中国的脉动。

文学研究所从北京大学迁至建国门内时，何其芳和家属分到的房子在北京日报印刷厂旁边。报社的印刷机夜以继日地轰鸣着，何其芳一边听着噪声，一边写作。听到印刷机的声音，“我身上也有个小小的马达，深夜开动，和它应答”（《北京的夜晚》，1972年）。他想，因为有声音，北京才有生气，自己也一样。

与书斋的窗户一墙之隔的是一座垃圾场，深夜，印刷机停了，卡车又轰隆轰隆地开始工作，卡车走后，静寂才终于降临书斋。

提到声音，联想到他的一位亲戚写道：何其芳是音盲。他终生为他是音盲而感到自卑。然而，也许正是因为这，何其芳成为一个对声音和音响十分敏感的、积极的诗人。我不禁想起他写的《河》中，“没有水的地方就是沙漠，没有声音的地方就是寂寞”的诗句。

音盲与何其芳的组合，唤起一个颇愉快的形象：虽然不能与少女们合唱恋歌，但却能给她们讲音乐般美丽动听的故事，我可以想象一位十分认真的音盲少年形象。在何其芳晚年未完成的小说里有如下一节：

董千里沉默了一会儿，又继续说：“我不会唱歌，也就像那个可怜的小美人鱼被海里的女巫割掉了舌头一样。”

“你怎么这样说呵!”李蜀琴又叫着说。

叶若兰用同情的抚爱的眼光看了董千里一下，没有说什么话。

小说的场景是四川省万县，距北京的直线距离是将近两千公里。当时，到万县的乡里，水陆兼程要7天，之后，步行一天。出生在万县乡下的中学生何其芳，读了自学英语教材中的安徒生作品，并为之倾倒。为了爱情，用声音和爱情做交换的可怜的小美人鱼，像一位喜怒无常的诗神，从书中步入少年的心房。

他从中学生时代起就用豆粒大的小字将英语单词的意思写在教材的空白处。成年以后，他还是一丝不苟地用蝇头小楷书写。我在何其芳所藏书里，看那漂亮的小字楷书的批注，使我联想起“感性的紧张”一语。

同情的目光投向音盲的少年——小说中的叶若兰——一位眼睛会说话的少女，不久，将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初恋对象。大学生时代的何其芳失去这段初恋爱情后，写了几篇诗作。

你青春的声音使我悲哀。
我嫉妒它如流水声睡在绿草里，
如群星坠落到秋天的湖滨，
更嫉妒它产生从你圆滑的嘴唇。
你这颗有成熟的香味的红色果实，
不知将被啮于谁的幸福的嘴。

对于梦里的一枝花，
或者一角衣裳的爱恋是无希望的。
无希望的爱恋是温柔的。
我害着更温柔的怀念病，

自从你遗下明珠似的声音，
触惊到我忧郁的思想。（《赠人》，1932年）

他哀叹写诗的自己是一支不吹“奇异的风”就无法作声的芦笛。纵然不能合着少女的声音唱恋歌，却可以献上诗歌。

芦苇死去，转生为芦笛，我时常想象他脑海中那时而浮现时而消失的芦苇丛生的河畔景象。一刻不停地哗哗流动的河水，无数棵芦苇，化作无数个无声，眺望着河水。他，一位音盲，不停地思考着声与恋、声与爱的交换，也许他梦见自己得到了声音美妙的芦笛。我不断幻想着他度过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里都有得到芦笛的可能性。

想象中的何其芳，内心像美人鱼一样，他的每一天都演奏着音盲之歌。在聆听少女歌声的万县、重庆的码头，在发出野狗吞噬尸体吼声的天津堤防，在婴儿不停地啼哭的开往重庆的军用卡车里，在延安山上的窑洞里，在陕北连绵不断的黄褐色土山中，在平山百姓家的炕头上……

在那日日夜夜里，他跋山涉水，穿田越野，向着山顶，越过铁路，自己喊叫着并回应着：

“爱，是什么？”

“那就是声音。”

“声音，是什么？”

“那就是爱。”

音盲或许造就了他作为诗人在资质上有相当的倾向性。

北京的夏天，嗓子干得冒烟。热茶是解暑的，但是，回到旅店里，就嚷着冰块儿，冰块儿，被起了个绰号叫“冰块儿先生”的日本作家，我倒不觉得可笑。

“过几天我们要去的四川省，可没有这个条件。”

给我们做翻译的周美仪，代表北京市民给我和柁教授“打预防针”。我俩为了引起她的注意一个劲儿地喝着茶。

面庞轮廓清晰的美女秘书从门口向我们微微点头示意后，向周美仪打招呼。她们谙熟于接待不大懂中国话的外国人。点头示意的大致意思是：你们是谁，为什么来这里，这些我都知道。当时，我们不知道她的名字以及和我们的关系，仅知道她为我们安排这次旅行的全部日程。

“何其芳的夫人正赶往这里。”周美仪将美女秘书的话翻译过来后，就接着和她站着聊天。

柁教授对我说：“那么，今天我负责照相和录音。”“就是说一些客套话，不用录音了吧。”“有备无患嘛。”说着，他就将录音机放到桌子上。

我不打算对初次见面的何其芳遗孀发起提问攻势，再说，我想问的净是些难以回答的刨根问底的问题。即便可以问，又从何问起呢？

出发前，就知道能拜会他的遗孀。在飞机上、在机场驶向宾馆的汽车中，我几次在心中模拟着双方问答的情景。提问可以从这些话题开始：何其芳幼年时期，将自己比喻成小草；到了晚年，苦于一天数次发作的眩晕和意识障碍；何其芳 59 岁时，在信中流露出来的“我觉得我的真正的写作还没有开始，以前所有写的文字都不过是练习，是准备”的想法；等等。

20 世纪 20 年代初，万县田野的一处，有一块小小的砦石。知识少年想把自己像小草一样封闭在岩缝里，我喜欢他。倘若要我直截了当地问少年，我的提问将不得不直捣故人的心灵深处。

“小时候的何其芳多大程度意识到自己的精神病遗传血统？”或者，“少年时期就经常侵扰何其芳的胁迫感是怎么回事？”

这个提问还引诱我提出与此相关的下一个问题：“何其芳先生

的晚年，经常苦于眩晕和意识障碍，是什么引发了这种神志不清？”

或者，把自己的工作“在《个人档案》中介绍道：我只是零碎地搞了一点点文学研究”，他是真心这样想吗？

关于自己的工作，他常用“零碎”、“无序”、“东拼西凑”来形容，可能他喜欢这种说法。我在多次胡思乱想中，拘泥于经常碰到“零碎”一词。何其芳但凡形容自己的时候，常会使用这个词汇。在《个人档案》里，用“零碎”二字形容自己创作初期的诗：“在一本秘藏的小手册上以早期流行的形式写下我那些幼稚的情感，零碎的思想”（《梦中道路》）。

相反，也许关于“零碎”的提问，会与盘问他隐藏着的自负和自信有异曲同工之处。一阵近似狂想的虚构式的“对谈”权且告一段落。我暗忖不管什么样的提问都不能显得过于苛刻，有失教养。

那种琐碎、无序的，过于主观而无思想、无政治性的提问是无论如何都通不过的。牟决鸣女士作为何其芳一生的战友，面对初次见面的外国人提出的这种问题，恐怕会有受盘问的感觉吧。因为那些疑问属于何其芳的个人隐私，原本应当直接询问本人，而且答案也只有本人知道。

即使和柊教授商量，他也只能随声附和吧。柊不会给我答案，周美仪也只是听意见，即便听了意见也于事无补。根据以往的经验，她的回答肯定是这样的“不要客气，什么都可以问”。

我和柊跟她相识有十几年了。“文化大革命”以后，过了两年多，像我这样与中国要人没有任何关系的普通日本人终于可以访问中国了。准确地说，也走了一些小门路，有了这个小门路，事态发生了变化。

由于是初次访华，我们怀着紧张的心情抵达了北京机场。当时和作家协会的人们一起迎接我们的就是她。

不知有什么诀窍，我们没有办理入境手续，就直接上了前来迎接的面包车。

在面包车上，她做了自我介绍，外国语大学日语专业毕业的翻译新手，过了若干年后，才听她说起当时很紧张，但当时却一点儿也看不出来。

她的翻译特点是果断干脆，无论单词的选择方法，还是语言的表达方式。她似乎能够一边翻译一边将我们的心情梳理得明快起来。这边抑郁婉转的表达，经过她大脑的翻译线路，都变成了完全和她的气质一样的表里如一的话语。

到了兰州，我和我的同伴只会这样说：“日本空军轰炸了兰州的这座大桥，我们日本人干了很残酷的事，我们的心情很沉痛。即便如此说，即便意识到了这一点，不知不觉此时我们已经来到了这里。”

黄河游览船宽阔的上层甲板被接待我们的兰州文艺协会人员和她的，还有我们六七个人全部占领了。下层普通的甲板被中国游客拥挤得水泄不通，他们争相眺望风景，同时也可沐浴到河面上习习吹来的凉风。现在的困惑与对历史的羞耻使我不知所措，只好佯装观赏着跟日本三大急流之一的最上川的下游一样变得狭窄的黄河水。

为了让我们先下船，普通游客都在出口处等候，踩得船板嘎吱嘎吱响。在往汽车上走的路上，身着白衬衫、系着红领巾等候的少男少女们，热烈鼓掌欢迎我们。

经历了如此的白天，在晚上的欢迎宴上，我们一行中的某一位只好发表了一番痛苦至极的讲话。

周美仪可能是这样翻译的：“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炸毁了兰州的桥梁。同样作为日本人，我们心怀内疚。早就想到这条街上来看一看，很高兴这一愿望得以实现。”

她翻译的中文，我只能听懂两三成，把我听懂的单词连缀起来，勉强能猜出大意：“我们的心情是很沉痛的，但不知不觉我

们已经踏上了这片土地”，那些凝重的、犹疑不决的话，真不知怎么翻译才好。

我观察她翻译的时候，将要点记在小笔记本上，然后，一气呵成地翻译下去。对于“虽然”、“尽管如此”、“这样的”等间断句子的日语接续词是否在笔记本上用中文写成“可是”、“也许”、“不过”？

这次访问结束后，我们和周美仪在北京、东京也见过五六次。在其担任翻译的年代，她经常作为中方代表团的翻译或秘书长来日本。我们当中的某一个接到她来日本的消息后，就互相打招呼，举行以她为中心的聚餐会。我们将她的访日权且作为又增加一次喝酒的机会而热烈欢迎。在作为客人的她面前，我们争论、吵架，一醉方休。她曾先后两次陪同我们访华，十分熟悉我们的醉态，她从不厌烦，连眉头都不皱一下。我们谁都没有留意过这一点，当然也有故意不理会的意味。

从人到中年的我们来看周美仪，她是孕育了艾青和丁玲那样的作家，并且令人难以置信地实现了人民革命的成功，使人憧憬的共和国的圣母玛利亚。在和她保持一定距离的交往之中，她结婚生了儿子。每次见面，她的日语词汇都在增殖，但是表现自己意志时的用语还是一如既往的果断。

那一年，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那时，她正作为研究日语的客座教授在东京逗留一年。我请她教北京话的发音和表达方式。

周美仪是一位严格的老师，特别在纠正发音方面一丝不苟。何其芳少年时代的私塾老师，用木板敲打记性不佳的学生，她用手指取代木板，当需要收紧嘴唇而我没有收紧的时候，她就比划着要拧我的嘴唇。我接受了她的责罚。比如，那个简单的“不”字的发音，我也会忘了收紧嘴唇，只好认罚。

上课的后半段时间，时常是我用不熟练的中文和她自由对话。话题马上会转为社会科学方面的一般问题。虽然，学习语

言，常用语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对不起”、“下站下车”、“小程在院子里养金鱼”之类的话显得过于无聊。

聊起“文化大革命”、农村的社会结构等社会科学的一般话题时，我们马上就掺进日语。

有一天的个人讲课聊起家庭话题。那些用中文开始的会话大致如下：

“老师的父亲是做什么的？”

“父亲嘛，父亲已经退休了。”

“那他退休之前是做什么的呀？”

“为什么要问呀？”

“作为会话练习。”

“是解放军。”

“在解放军里是大官吧。”

“不是。”

“那军衔是什么呀？”

为了语言不熟练的学生，回答都很简洁。同听力和词汇都很差的初学者的对话，只能是断断续续的。如此简单的对话，我也听不懂“退休”一词，拿出纸来，请她写上“退休”、“离休”。“解放军”的“军”的发音也被她一一纠正。

这种会话，对于我来说，作为一个学生，从一开始就没觉得存在什么真实感。会话就是会话，会话中的人物啦，感情呀都不具体存在。比如说，“军”只是作为一个很难的发音摆在我面前。我并不知道她却是怀着对家族历史的感慨，回答着我的问题。至于她回答时的窘迫，我却丝毫没有意识到。

“是啊，是师长或少将吧。”

团、旅、师等，中国的军衔构成也是很复杂的。她又重新用

日语回答，此后，会话全都改为用日语。

周美仪老师的父亲现在是退役将军，作为人生最初的觉醒是参加了红军。老师接着说：父亲出生在山东，家中只有男孩，是三兄弟中的老小。父亲的大哥，在中国与日本开战之初就离开村庄参加了红军，在与日军的战斗中牺牲了。日军占领山东后，二哥被当做人质投入牢房。这是听奶奶说的。日军命令村民如期交出铁制的锅和锄头，否则，将杀害人质。由于过了期限，失去了二哥的父亲为了和日军作战，十二岁时，便投奔了红军。奶奶还健在，生活在山东的某个村庄里。

如果用资料补充周美仪的话，当时，山东省南部是共产党军队的游击根据地，日军曾反复在鲁南“扫荡”作战。作战的目的是歼灭鲁南红军及其基地设施，同时，也残酷地搜刮物资和劳力。山东的年轻人和孩子要么被杀害，要么被征劳役，所以与日军作战，或许是唯一生存的办法。

周美仪的父亲成为游击队的“小鬼”的时候，日军对长达50天的鲁南“讨伐”作战的战果是这样描述的：

战斗次数 163、交战敌军兵力 48143，摧毁敌方诸设施、兵工厂 2、手榴弹制造厂 1、兵器库 2、弹药库 1、被服工厂 1、被服库 4、粮库 48、医院 2、小学 1、合作社 2、棉花加工厂 2、报社 1、俘虏 1149、遗弃尸体 5075、战利品小枪 3563、马匹 745、缝纫机 7、铜线 5 万米、电线 164405 米、军装 1382、棉花 23936 公斤、羊毛 3735 公斤、牛 4615、羊和山羊 13885、猪 97、粮草 1583.7 吨、食盐 174.9 吨。（《十五年战史》，青木书店）

偶然发现的记录，可以理解周美仪一家发生不幸和抵抗的理由及背景。日军是杀戮者、掠夺者。基本生活物资被抢劫一空，即使免遭枪杀，也无法生存下去。